



中国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

杨绛



在 60 年代初 我有幸在物理学家‘朝圣’之地、原子物理的故乡——丹麦哥本哈根度过了两年。在那里，我学到了物理学的一些新知识，至今仍感到得益匪浅。但同样重要的是，我深为本世纪两位物理学大师之一的尼耳斯·玻尔的爱国主义情操所感染，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以至每当讲到爱国主义，我总情不自禁地会想到这位令人尊敬的物理学家。

玻尔是在 1913 年（即从英国学习后归国的第二年）提出了永载史册的原子结构理论，并因此于 1922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本世纪物理学有两大创造：一是相对论，一是量子力学。前者是爱因斯坦的贡献，后者则是玻尔为首的一批科学家集体努力的结果。在本世纪初，丹麦几乎无物理学可言，但玻尔决心要在人口不到 500 万的国土上建立起自己的物理学中心。他婉拒了他的老师和挚友——英国的卢瑟福教授几次重

金聘请，也婉拒了量子论的创始人——德国的普朗克教授提供的“一个与爱因斯坦相当的职位”而于 1921 年在哥本哈根创建了自己的物理研究所。即使在研究所成立之后，国外的邀请信仍像雪片那样飞来，既有英国皇家学会的，也有美国芝加哥的、费城的……但都被玻尔一一拒绝并说了“最后的话”：“在国外能得到的经济上的报酬，无论如何也补偿不了我在哥本哈根研究所内所获得的乐趣。”特别难能可贵的是 1939 年初，玻尔正在美国访问，希特勒燃起的战火已经烧到丹麦，对犹太人开始了疯狂的迫害。玻尔因母亲的关系而受到威胁。此时，美国每一所高校的大门都向玻尔敞开，但玻尔依然执意返回自己的祖国。

玻尔高尚的爱国情操和执著的科学追求终于结出了硕果：丹麦成了当时世界上物理学的三大中心之一，成了物理学家心目中的“麦加”。在笔者几次对丹麦的访问中，都深深感到丹麦人民对玻尔的爱戴。它雄辩地证明了：科学虽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他们的成就维系着祖国的兴衰荣辱，他们的命运是同祖国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对一个小国是这样，对一个大国更是这样。

我为生活在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国而感到自豪，不过话要说回来，这个“自豪”感只是在新中国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才获得了应有的尊严。记得 1963 年曾听到过陈毅元帅讲的故事：陈毅在留法期间，一次乘无轨电车遇上一位老太太，陈毅为她让了座，但谁也不会料到，当这位老太太知道陈毅是中国人时，竟站起来说：“中国人坐过的位子我不要坐。”这情景与我在丹麦的遭遇真可谓天壤之别。那时的哥本哈根物理研究所只有 30 个丹麦人，外国人则有 50 个，其中除我同

另两个中国人外，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绝大多数的人都渴望了解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邀请我们的晚会真是应接不暇，最多的一个星期有五个晚会。没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哪有中国留学生的尊严。

玻尔一直引用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名言：“丹麦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的家乡，这里就是我心里的世界开始的地方。”并在“就是”两字下面加上着重号，以此来陶冶自己的思想情操，激励自己为祖国的昌盛建功立业。如果“丹麦”两字改成中国，那就可算是我的人生哲学了。中国是我心里的世界开始的地方，也是我实现人生追求的地方。确实，中国是穷了一点，我当时就意识到，虽然我们的生活比以前好了不知多少倍，但要



达到丹麦人民的生活水平，恐怕要下一代了。不过，正因为有差距，才更需要我们去努力！国兴旺，教育是本，我们需要有炼铁成钢的炉子。因此，我一方面庆幸自己有机会在世界上第一流的实验室工作，另一方面则憧憬在不久的将来能有自己的炼钢“炉子”，决心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具有国际水准的实验室，使我的祖国在世界的现代科学殿堂里也能得到她应有的席位。这似乎是一种梦想，然而却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梦想”，以至使我在我人生的道路上，也屡次婉拒国际同行们的重金相聘，为实现这个诱人的“梦想”苦苦追求不已。

从丹麦归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遭受了各种曲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终于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错误，使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篇章。我在丹麦玻尔研究所的“串列静电加速器”实验室工作过，可以说是接触过串列加速器的少数中国学者之一，可是今天，在中国的大地上，至少已有十个串列加速器实验室，它们都是在 80 年代建立起来的。我所在的实验室经过同事们多年的共同奋斗，终于在 1989 年被国内第一流专家评定为国内领先、达到国际水平的实验室，国内第一批实验核物理博士已从这里诞生。

我的“梦”实现得晚了一点，曲折了一点。但曲折的途径使我见到了更多的榜样。艰难的历程更能锻炼人、磨炼人。我所处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例如人们所尊敬的谢希德教授，1952 年从国外归来，为开创我国半导体事业费尽心血，10 年的磨难并没有使她意志消沉，相反，她更积极了，为祖国的明天在日夜忙碌。再譬如，我在沙漠戈壁滩遇到的邓稼先教授，是那么谦虚、那么简朴。他 50 年代初从美国归来后就鲜为人知，但他为祖国的核科学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他与杨振宁

教授是同年代的人，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决不是能用诺贝尔奖所能表达的。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人民会永远怀念他。安徒生、玻尔使 500 万人口的小国闪闪发光，同样，以邓稼先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使我们这个千年的文明古国，在世界民族之林又重放出青春的光华。

我的‘梦’还未做完 因此还要苦苦地追求下去。我盼望与大家一起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

杨福家 核物理学家。1936 年 6 月 11 日生于上海（原籍浙江镇海）。1958 年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工作，现任该校教授、校长，兼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199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领导、组织并基本建成了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完成一批在国际上受到重视的工作。在原子核能谱学方面，实验上发现的一些新能级数据，25 年来一直被国际同行采用；在级联衰变方面，给出复杂能级的衰变公式，概括了国内外已知的各种公式，较广泛地用于放射性厂矿企业，并推广至核能级寿命测量，给出了图心法测量核寿命的普适公式；领导实验组用 γ 共振吸收法发现了国际上用此法找到的最窄的双重态（900eV）；在国内开创离子束分析研究领域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首次采用双箔（直箔加斜箔）研究斜箔引起的极化转移，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用单晶金箔研究沟道效应对极化的影响，确认极化机制；在国际上首次把运动电场用于束箔机制；参与的实验组在国内首先开展激光束—离子束相互作用研究，并精确地测定了一些参数。所著《原子物理学》获 1987 年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兢兢业业为祖国工作

赵忠尧



我出生于 20 世纪初叶。父母亲老年得子，又加我身体瘦弱，对我管教格外严厉。不许我上体操课 体操成绩因此总是零分。我从小只是体育场边的观众。50 多岁时 才迫切感到锻练身体的需要 开始学游泳、滑冰 虽然晚了一些 仍然受益匪浅。

15 岁那年进入诸暨县立中学读书。四年后中学毕业，报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 年秋进入数理化学部就读。1924 年春，我提前半年修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分。次年取得了东南大学毕业资格。

1925 年夏，北京清华学堂筹办大学本科，请叶企孙教授前往任教。他邀我和施汝为一同前往清华。叶企孙教授为人严肃庄重 教书极为认真 对我的教学、科研都有很深的影

响。看到国内水平与国外的差距 我决定出国留学。靠自筹经费于 1927 年去美国留学。除三年教书的工资结余及师友借助力外，还申请到清华大学的国外生活半费补助金每月 40 美元。到美国后，我进入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院，师从密立根（R. A. Millikan）教授进行实验物理研究。

密立根教授起初给我一个利用光学干涉仪的论文题目。两年内得出结果，就可以取得学位。我感到这样的研究过分顺利，把这个意思告诉密立根教授，问他能否换一个可以学到更多东西的题目。密立根教授尽管感到意外，但还是给我换了一个“硬 γ 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的题目，并说：“这个题目你考虑一下。”说是这么说，这次实际上是不容我再考虑的。偏偏我过分老实，觉得测量吸收系数还嫌简单，竟回答说：“好，我考虑一下。”密立根教授一听，当场就发火了，说道：“这个题目很有意思，相当重要。我们看了你的成绩，觉得你做还比较合适。你要是不做，告诉我就是了，不必再考虑。”我连忙表示愿意接受这个题目。回想起来，密立根教授为我选择的这个题目，不仅能学到实验技术，物理上也是极有意义的。这一点，我在以后才逐渐有深刻体会。

我便开始作硬 γ 射线吸收系数的测量。实验室工作紧张时，我常常是上午上课，下午准备仪器，晚上乘夜深人静，通宵取数据。1929 年底我将结果整理写成论文。但由于实验结果与密立根教授预期的不相符，他不甚相信。文章交他之后两三个月仍无回音，我心中甚为焦急。幸而替密立根教授代管研究生工作的鲍文 (I. S. Bowen) 教授十分了解该实验的全过程，他向密立根教授保证了实验结果的可靠性，文章才得以于 1930 年 5 月在美国的《国家科学院院报》上发表。

当我在加州作硬 γ 射线吸收系数测量时，英、德两国有几位物理学家也在进行这一测量。三处同时分别发现了硬 γ 射线在重元素上的反常吸收，并都认为可能是原子核的作用所引起的。

吸收系数的测量结束后，我想进一步研究 γ 射线与物质

相互作用的机制 打算设计一个新的实验 观察并测量重元素对硬 γ 的散射。当时虽然离毕业只有大半年时间了，但由于有了第一个实验的经验，我还是决心一试。我于 1930 年春天开始用高压电离室和真空静电计进行测量。这个实验一直忙到当年 9 月才算结束。实验结果首次发现 伴随着硬 γ 射线在重元素中的反常吸收，还存在一种特殊辐射，并且还测得了这种特殊辐射的能量大约等于一个电子的质量，它的角分布大致为各向同性。我将这一结果写成第二篇论文《硬 γ 射线的散射》于 1930 年 10 月发表于美国的《物理评论》杂志。

说来有趣，在评论论文时，密立根教授还记得我挑论文题目的事。说：“这个人不知天高地厚，我那时给他这个题目，他还说要考虑考虑。”惹得同事们哈哈大笑。不过 他们对我的论文是满意的。后来，密立根教授在他 1946 年出版的专著《电子、质子、光子、中子、介子和宇宙线》中还多处引述了我论文中的结果。

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揭示了一种新的相互作用机制。但是，当时还不能认识到这些现象的具体机理。与我同时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的还有安德孙（C. D. Anderson）他对这些结果很感兴趣。到 1932 年，安德孙在宇宙线的云雾室照片中发现了正电子径迹，人们才逐步认识到：三个实验组同时发现的反常吸收是由于部分硬 γ 射线经过原子核附近时转化为正负电子对；而我发现的特殊辐射则是一对正负电子湮灭并转化为一对光子的湮灭辐射。

关于对我这部工作的评价，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杨振宁教授花了不少精力，收集整理资料，于 1989 年写成文章发表 帮助澄清这段历史 我十

分感激杨先生为此所作的许多努力。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时我尚在国外，国难当头，心中焦急，决心尽速回国，回到清华大学任教。当时，清华大学正在成长过程中，师生全都非常积极。叶企孙教授从理学院调任校务委员会主任。物理系还有萨本栋、周培源等多位教授。这个时期，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大家齐心协力，进行教学和科研，办好物理系，实为难得。

“七七事变”之后第二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共同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大，我便在那里任教。这期间，我还与张文裕教授用盖革—密勒计数器作了一些宇宙线方面的研究工作。可是，随着战局紧张，生活变得很不安定。由于物价飞涨，教授们不得不想办法挣钱贴补家用，我自制些肥皂出售，方能勉强维持。加上日寇飞机狂轰滥炸，课程进行中，警报一响，大家就得立即收拾书包，骑车去找防空洞。家人则更是扶老携幼逃往城外。开始人们以为很安全的城墙根很快被炸为废墟。华罗庚先生甚至被爆炸的土块埋住后逃生。尽管如此，西南联大聚集了各地的许多人才，教学工作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一直坚持进行，也的确培养出不少有用人才。1945 年冬，我应中央大学吴有训校长邀请，离开西南联大，赴重庆担任了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

1946 年夏，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岛进行原子弹试验。我受中央研究院的推荐，作为科学家的代表去参观。那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萨本栋先生托我在参观完毕以后，买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用的器材。钱数实在太少，不可能购买任何完整的设备，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自行设计一台加速器，购买国内难于买到的部件和其他少量的核物理器材。照这个计划，我首先在

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静电加速器的制造。半年后，为了进一步学习离子源的技术，我转去华盛顿卡内基磁研究所访问。当时，毕德显先生正准备回国，我挽留他多呆半年，一起继续静电加速器的设计，并采购电子学及其他零星器材。毕德显先生为人极其忠厚，工作踏实，又有电子技术方面的实践经验，对加速器的设计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半年后，为了寻找厂家定制加速器部件，我又重返麻省理工学院的宇宙线研究室。该研究室主任罗西 (Rossi) 欢迎我到 he 那里工作。他很了解我的工作。1952 年他的专著《高能粒子》中就引用了不少我拍的云雾室照片。与此同时，我还替中央大学定制了一个多板云雾室，并且买好了与此配套的照相设备。这期间，我曾在几个加速器、宇宙线实验室义务工作，以换取学习与咨询的方便，也换得了一批代制的电子学仪器和其他零星器材，节约了购置设备的开支。制造和购买器材的工作花了整整两年时间。

1949 年，我开始作回国的准备工作。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自然是那批花了几十年心血定制的加速器部件与核物理实验器材。我利用 1949~1950 年初中美之间短暂的通航时期，重新联系轮船公司，设法将器材从与国民党有联系的仓库里取出来，办理托运回新中国的手续。没想到，联邦调查局盯上了这批仪器设备。他们不但派人私自到运输公司开箱检查，还到加州理工学院去调查。幸好，加州理工学院的杜曼 (Dumand) 教授为人正直，告诉他们这些器材与原子武器毫无关系。虽然如此，他们仍然扣去了部分器材。就这样，我在美国定制的这批器材装了大小 30 多箱，总算能装船起运了。

1950 年春天，我准备返回祖国。但是，这时中美之间的通航却已中止了。经过 5 个多月的等待，我与一批急于回国的留

美人员终于得到了签证，于 8 月底在洛杉矶登上了开往中国的威尔逊总统号海轮。可一上船，联邦调查局的人又来找麻烦，把我的行李翻了一遍，偏偏扣留了我最宝贵的物理书籍和期刊。轮船终于开动了，旅途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船到横滨，我和另外两个从加州理工学院回来的人又被美军便衣人员叫去检查，硬说我们可能带有秘密资料，随身行李一件件查，我的工作笔记本都被抄走了。三个人就这样被关进了日本的巢鸭监狱。同时，台湾当局则派各方代表威胁利诱，说只要愿意回美国或去台湾，一切都好商量。我那时回国的决心已定，反正除了中国大陆我哪儿也不去。直到这一年 11 月，在祖国人民和国际科学界同行的声援下，我们才获得释放。经历数月的磨难，我终于回到解放了的新中国。



我在美国费尽心机与艰难购置的一点器材，大都安全运回了国内。1955 年装配完成我国第一台 700keV 质子静电加速器。同时，我们还研制了一台 2.5MeV 的高气压型质子静电加速器。在建立实验室和研制加速器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学习了真空技术、高电压技术、离子源技术、核物理实验方法 而且在工作中培养了踏实严谨、一丝不苟的科学作风，一批中青年科技骨干迅速成长起来。

另一方面，为了迅速扩大科研队伍，提高队伍的素质，中国科学院于 1958 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我兼任近代物理系的主任。由于与研究所的密切联系，使近代物理系得以较快地建立起专业实验室，开设了 β 谱仪、气泡室、 γ 共振散射、穆斯堡尔效应、核反应等较先进的实验。我们很注意培养方法，尽可能使学生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都得到发展，培养出一批理论实验并重的人才。科大能在短短的时间内与国内一流大学获同等声誉，实非易事，广大师生员工为此作出了艰巨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 我因“特嫌”而被隔离审查。被审查期间，我写了几万字的材料，也对自己走过的道路重新进行回顾与思考。我想，一个人能作出多少事情，很大程度上是时代决定的。由于我才能微薄，加上条件的限制，没有做出多少成绩。唯一可以自慰的是，60 多年来，我一直在为祖国兢兢业业地工作 说老实话 做老实事 没有谋取私利 没有虚度光阴。

1973 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看着中国自己的高能加速器破土动工、建成出束，看到中青年科技人员成长起来，队伍不断壮大，真是感慨万千！回想自己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唯一希望的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达。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国家尚未摆脱贫穷与落后，尚需当今与后世无私的

有为青年再接再厉 继续努力

赵忠尧 核物理学家。1902年6月27日生于浙江诸暨。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建为东南大学）。1925年东南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助教。1927年赴美留学。1930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1929~1930年曾与欧洲几位学者同时发现 γ 射线通过重物质时的“反常吸收”。首先在硬 γ 射线被铅散射的实验中发现“特殊辐射”是正负电子对产生和湮没过程的最早实验证据，是发现正电子的前奏。1931年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校教授。1946年赴美进行核物理和宇宙线研究，并为国内设计和加工质子静电加速器，选购和订制实验设备。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冲破重重困难毅然回国，并带回当时国内尚无条件制备的上述器材。1964年起当选为第三届到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五六十年代主持建立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主持建造了中国最早的加速器，并进行原子核反应的研究。为开创中国原子核科学事业和培养核物理研究人才作出重大贡献。发表《硬 γ 射线和原子核的相互作用》等研究论文数十篇，并主编《原子能的原理和应用》等专著。

祖国再穷也是自己的

钱三强



记得 15 岁那年（即 1928 年）我还在蔡元培先生任校长的北平孔德学校读书（“孔德”是取法国近代实证主义哲学家的姓“Comte”的译音）有一天，我偶尔读到孙中山先生著的《建国方略》，书中把未来中国的蓝图描绘得十分鼓舞人：以兰州为中心的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的大港……。读着读着，仿佛走出黑暗涵洞，立见光明。可是合上书本一想，由落后到富强，由黑暗到光明，其间有多么长多么大的空白要去填充啊！朦胧中感到有责任响应孙先生的主张。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了建立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于是我决意集中精力学习数学与物理，以备考南洋大学（即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学电机工程，直接投身未来光明中国的建设。

家父（钱玄同）对我们的学习兴趣从不干涉。他的原则是：“你们将来学什么，我不包办代替出主意，由你们自己去选择。但是一个人应该有科学的头脑，对于一切事物，应该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研求其真相，判断其是非，然后定改革的措施。”

他知道了我的想法之后 欣然支持。不过 他提醒我 南洋大学用的是英文课本，而我在孔德学校学的外语是法文，恐难适应。因此，1929年我于孔德学校高中部毕业时，先考进了北京大学理科预科，以期英文适应后再考南洋大学。

在年轻人心目中，诱人的事情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缭乱。原子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而诱人的学科，尤其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是该学科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那时 北大理科常请清华的教授 如吴有训、萨本栋先生 来讲授近代物理和电磁学。他们授课不照本宣科，对于基本概念和难懂的关节点重复地讲解 还边讲边演示 使初学者听得清晰 记得牢。一次 吴先生讲“振动与共振”他在讲堂横拉了一根长绳 在等距离地方垂下一根根短线，短线上各系着一个用过的大号干电池，共挂了8节电池。他表演时，先在横绳垂直方向推动第一节电池，第一节电池便开始作单摆运动，不一会儿摆动逐渐减弱，而第二节电池则开始自动摆动起来，以后各节也依次摆动起来。这些用最普通的试验器材作的形象表演，非常生动地显示了简谐运动和共振现象。在刚学力学时，简谐运动和共振现象都是比较难懂的概念，但经吴先生讲解和演示后 道理就比较容易懂了。这样，我的学习兴趣又渐渐转向了物理。1932年 我便改变学工科的初衷，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很巧，就在这一年的2月，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J. Chadwick)，根据从法国传来的伊莱娜·居里(I. Curie)和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居里(F. Joliot-Curie)夫妇提供的实验结果 进行一系列实验 证实了她(他)们发现的所谓“类似于 γ 射线在电子上散射的康普顿效应”并且宣布该效应可以解

释为此种辐射中含有一种新的粒子——中子，从而获得了 1935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约里奥—居里夫妇本来早于查德威克一个多月作出了发现中子的实验结果，就是说已经在事实上发现了中子，可惜的是约里奥—居里夫妇没有在理论解释上跨出这一步，因而使这项划时代的重大发现，从自己的手中溜掉了，成为科学史上一大憾事。后来，约里奥先生还亲自和我说起这段往事，他说：“真笨死了，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摆在那里了，我们怎么会想不到这一点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值得庆幸的是，约里奥—居里夫妇由于发现人工放射性，也获得了 1935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还巧的是，我 1936 年从清华毕业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约莫过了半年时间，在严济慈所长鼓励下，我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留法学生考试，当时有镭学、流体力学和微生物学各一个名额。结果我考取了镭学名额，是到世界上原子核科学研究最先进的机构之一——居里实验室，而且指导我博士论文的导师正好又是约里奥—居里夫妇。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这是何等幸运！

然而，现实的中国却是如此不幸。正当我赴法行期在即，芦沟桥事变爆发，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中国人的脊梁；当局又是那样腐败无能，什么民族气节和国格，一切荡然！民众的心在剧痛，在流血！加之家父由于忧愤国势，高血压病骤然加重，凶吉难卜。我踌躇了：国难家患临头，我能忍心离去吗？

父亲察觉了我的心思，强忍着痛苦和离愁劝导我：“这次出国，是难得的机会。你学的东西，将来对国家是有用的。报效祖国，造福社会，路程远得很哩！男儿之志，不能只顾近忧

啊！”就这样，我在 1937 年夏秋之交，经过一个多月的海轮航行抵达巴黎。没有料到在这里竟工作、生活了 11 年，还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颠沛流离……。

一个外国科学工作者在法国晋升为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高职，又获得了一定的荣誉，很自然，周围的人们都据此以为我们会长期在这里工作下去。但是，我和泽慧的想法很明确：祖国再穷也是自己的；而且正因为她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她的面貌。

于是，我于 1948 年初夏向约里奥先生和伊莱娜夫人郑重提出回国要求。他们尽管很舍不得我们走，为我们离去而惋惜，但听了我们的陈述之后，都表示理解，赞成我们的决定。约里奥先生说：“我要是你的话，也会这样做的。”他们把当时还很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我们，还将一些放射性材料及放射源交给我们带回国。伊

